

# 健康码治理的媒介化创新过程与风险规制路径

别君华<sup>1</sup>, 金慧芳<sup>2</sup>

(1. 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 浙江杭州 311121;

2.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杭州 311121)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以健康码为主的媒介化治理为控制疫情、保障日常生活有序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健康码的媒介化治理创新过程体现了媒介化理论的“社会建构”与“制度化”两种传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期, 媒介作为“行动者”能动地勾连起社会治理多元主体, 促动初级人机协同的动态治理网络形成。稳定与冲突交替的常态化时期, 治理网络逐渐进化为撬动诸多社会场域变革的“制度化”力量。媒介化治理创新存在数据安全、隐形技术追踪、平台垄断等潜在风险。规范数据治理条例、行使公众被遗忘权、加强平台治理、提升公众自主权等风险规制措施, 成为实现媒介化治理向善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 突发公共事件; 健康码; 媒介化; 人机协同; 风险规制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2) 01-0019-10

## 一、突发公共事件的媒介化力量

在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 媒介日益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针对疫情防控创新媒介治理手段成为各国工作重点。巴西的库里蒂巴市通过在线视频电话帮助新冠肺炎疑似患者进行远程医疗预约; 新加坡采用“Trace Together”应用程序追踪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并开发了全国性数字登记系统“Safe Entry”, 还将Robodog机器人放置在公园宣传呼吁公众保持社交距离;<sup>[1]</sup> 韩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KCDC)通过医疗设施记录、全球定位系统、银行卡交易和CCTV闭路电视等四种手段对病毒接触者进行调查管理。<sup>[2]</sup> 而我国则采用了健康码这一电子健康凭证系统, 以应对因人口过多、流动过快产生的疫情传播问题, 确保在公共场所自由通行人员皆为绿色健康码持有者, 从而减少新冠病毒的扩散。可见, 创新媒介化治理已成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重要手段。

何为媒介化治理? 学者戴宇辰提出, “从‘媒介研究’到‘媒介化研究’的转向事实上暗含着一一条将媒介实践视为一种动态性过程的研究进路”<sup>[3]</sup>。媒介化具有的动态性过程打破了将媒介简单视作“工具”的二元论藩篱。媒介化治理便意味着突发事件发生时, 以媒介作为“行动者”能动地勾连起社会治理多元主体, 使原本在同一事件中关联较弱甚至并不关联的各主体间形成互动网络。在这一人机协同异质网络中, 媒介并不仅仅承担“工具”角色, 而是作为“行动者”积极促动治理网络迅速行动, 在应急反应期将突发事件控制在可控范围内。此外, 在常态化时期, 媒介逐步渗透至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社会场域, 左右场域内不同主体的行动路线与行动方式, 成为撬动其他领域改革的“制度性”力量。实际上, 这一贯穿事件突发期与常态化时期的治理逻辑正对应媒介化理论的两种传统。

首先, 是学者库尔德利(Nick Couldry)提出的媒介化的“社会建构”传统。库尔德利从微观社会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数字抗疫背景下的人机传播与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以浙江省城市大脑为例”(21NDQN275YB)。

**作者简介:** 别君华, 女, 讲师, 博士; 金慧芳, 女, 硕士研究生。

互动层面出发,通过对媒介化与个体社会交往关系的论述,尤其是如何将个体私人实践与公共活动借由媒介化对个体交往情境的拓展进行勾连,提出了媒介化的社会建构论。这一传统“强调的是主体与传播工具的过程性互动,即媒介提供了新的传播手段,而这又为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的基本逻辑是社会建构的传统,即人类可以使用媒介来改变社会的建构方式。”<sup>[4]</sup>其次,是学者夏瓦(Stig Hjarvard)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场域理论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结构化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媒介化的“制度化”传统。夏瓦认为,“媒介在各场域不断增长的他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借此挑战了场域的自律。因此,媒介化的程度可以根据各自场域的自律在多大程度上被削减得以衡量”<sup>[5]</sup>。如上所述,从“媒介”到“媒介化”意味着媒介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关系的结构性转型,强调的是媒介与其他社会范畴相互建构的过程。是媒介日益增长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sup>[6]</sup>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理论内部存在不同的传统,但两种主张其实并不相悖,并且似乎正在经历相向运动的过程。

可以说,媒介化是对当前的媒介化社会极富解释力的理论。其与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所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对媒介如何深入社会实践乃至成为具有支配性社会结构力量的过程性描述,而非此前的媒介学者所秉持的那种定论般的媒介/社会静态后果论。此外,正如学者胡翼青所言,“与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媒介思想相比,媒介化理论又不满足于将媒介视为观念传递的中介、将视野局限在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上,而是致力于分析媒介实践对文化,也对政治、经济等社会制度的影响力。”<sup>[7]</sup>

今天,人们对媒介化的重视带动突发公共事件治理进入媒介化治理的新阶段。本文将以疫情发生以来健康码的媒介化治理创新为例,收集疫情突发期和常态化时期杭州、广州等地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经验材料。<sup>①</sup>在此基础上,本文尤其注重探索人机多元主体在历时性的合作/冲突中,收集并分析如何从最初的临时互动网络逐步沉淀为制度性的媒介化治理机制。

## 二、健康码的媒介化治理创新

### (一) 突发应急期媒介化动态治理网络的社会建构

疫情突发期,健康码作为一种应急治理手段而诞生。它作为行动者参与疫情治理,改变了突发事件的应急治理方式,形构了一个人机协同的动态治理网络。那么,在疫情突发应急期,这一治理网络是如何形成的?其间牵涉的各主体是如何互动的?

以最早推出健康码应用系统的杭州市为例分析发现,在疫情突发期,政府主体与平台主体的合作首先推动了健康码的诞生。杭州市数字化水平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20年2月4日,余杭区政府在抗疫部署会议中明确提出要建设一套数字化方案,并且要做到三个全:“全人群覆盖+全流程掌办+全领域联防”。<sup>[8]</sup>由此,在已具备“城市大脑”规划经验的数据资源管理局的牵头下,通过招标方式开展了智能媒介治理产品的研发工作。其中,余杭区小型科技企业“码全科技”率先研发出“健康码”的初步方案,初步方案通过后由“阿里巴巴”平台参与产品的后续研发、完善。在结合“码全科技”小平台迅速创新优势和“阿里巴巴”用户数据优势、算法优势、人才优势的基础上,健康码系统迅速投入治理工作,满足政府对数字化抗疫的需要。随后,浙江省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文件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健康码”机制,<sup>[9]</sup>保证健康码大面积有序使用。可见,政府的治理需求与平台创新优势的结

<sup>①</sup> 材料一方面来源于政务网站面向公众颁发的公开文件、通告,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浙江政务服务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等,另一方面来源于主流媒体、地方媒体及主流网络媒体平台相关报道,包括人民网、杭州网、腾讯网等。

合,为健康码诞生提供了基础条件。

接下来,公众主体与媒介行动者的互动,促进了健康码在事件突发期的社会覆盖和技术进化。公众作为健康码应用过程中数量最大的参与主体,在疫情初期虽然相对被动,配合政府和平台填报健康信息、使用健康码、进行健康打卡。但在适应健康码治理的过程中,公众也发展出一定的主动性,积极为政府和平台提供反馈与优化建议。例如,因公众反馈申请到了与事实不符的黄码和红码,平台开通了网络申诉的渠道同时优化判定规则,各区、县、市组建了健康码工作专班,加强线下信息核实来提高赋码的准确性。<sup>[10]</sup>由此,公众以健康码作为自下而上的感知端口与政府、平台发生互动,推进健康码的技术升级,参与到疫情防控治理网络中。

可见,在杭州这一具体的市级场域中,疫情突发时期的紧急治理需求首先转换为政府主体的治理逻辑、平台主体的创新逻辑、公众主体的需求逻辑,媒介化治理将不同主体的逻辑交织于健康码这一创新型媒介。以此,健康码开始促发其他行动主体的行动,如政府政策的出台、平台创新行动的持续、公众积极沟通反馈,在媒介化的促动下,各主体临时的、不稳定的互动构建起最初的动态应急治理网络。正如学者孙玮所说:“二维码作为一种移动数字技术的最典型形态,展示了媒介以动态机制汇聚城市社会异质化系统的动能,媒介成为社会系统及运作机制的传导器和转换中枢。”<sup>[11]</sup>

## (二) 常态化时期媒介化治理的制度化

随着国内疫情形势趋于缓和,健康码成为常态化治理的主要媒介手段,并逐渐催生一种基于健康码之上的新社会形态。孙玮指出,“形形色色的二维码的涌现,实质是社会系统的重组与再造”<sup>[11]</sup>。那么,在常态化治理期,这一治理网络是如何从最初的临时性不稳定样态进化到相对稳定的制度化治理网络,从而再造社会系统的呢?

首先,制度化治理网络的形成,一方面离不开人机治理网络中各个主体的积极行动和灵活的策略调整,另一方面也与常态化治理期频发的治理漏洞、缺陷及冲突密切相关。常态化治理初期,“一省一码”或“一市一码”现象屡见不鲜,这为实现城际数据的共享,以及提升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效率与城市间协作治理能力带来难题。面对这一情况,政府主动出击,上至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五个一”服务行动的通知》,<sup>[12]</sup>下至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长三角“健康码”互认通用机制落实工作的通知》等,<sup>[13]</sup>都推动了健康码的“省际互认”和“全国互认”。具体到城市治理领域,以广州市为例,广州市的“穗康码”不仅实现了与广东省的“粤康码”的信息融通,还完成了与国家“防疫健康信息码”的跨地区防疫信息共享和系统对接,实现“一码通行”。<sup>[14]</sup>

其次,平台主体在常态化治理时期继续发挥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在局部地区突发治理中积极响应公众与政府的需要。广州地区在2021年5月出现了德尔塔变异病毒株的传播。5月21日,荔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广州市荔湾区发现1例新冠肺炎核酸疑似阳性人员》。<sup>[15]</sup>平台由此推出了“穗康码”“黄码”,打破了广州健康码“红绿蓝”模式。广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表示,“黄码”制度的推行助力了疫情高效精准防控。<sup>[16]</sup>可见,此次黄码的开发也是在疫情防控的常态化时期,平台在公民与政府需求下的一次技术升级,平台创新与政府治理、市民防控形成了良性互动。最终,德尔塔毒株的突发被控制在广东地区内,2021年6月26日,中风险地区清零,<sup>[17]</sup>该地区再次进入平稳的常态化治理。

再次,公众基本能够遵照媒介逻辑和治理需求,自觉践行“佩戴口罩、出示健康码”的出行要求,自下而上防止疫情反弹。但随着健康码对个人生活的支配性愈发增强,公众端也产生了健康码的个人

信息被冒用、盗用和滥用等问题。对此,广州市“穗康码”平台启用“人脸识别”安全校验,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再如,针对老人、小孩以及不具备智能终端使用条件的数字边缘群体,广州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出台相关政策可由共同居住的成年亲属或所在居(村)民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安排人员代为线上申报生成“穗康码”并打印。<sup>[14]</sup>由此可见,公众主体在使用健康码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又能够推动健康码媒介化治理的完善。

最后,在疫情常态化时期,健康码通过与其他媒介互联、互动、互通,形成“码治理”“技术体”。由于健康码与身份标识相关联且具有唯一性,因而在具体场景中衍生出了更多应用,如与身份证、乘车码绑定使用,与电子健康卡、社保卡互联,出入小区“人码合一”刷脸验证,叠加复学规则形成“入学码”,<sup>[18]</sup>变身“金色健康码”代表已接种新冠疫苗,规划签约、诊疗、报告查询一体的“互联网+医疗健康”模式,<sup>[19]</sup>开发“防疫健康码国际版”小程序供中国籍人员入境使用等。此外,随着常态化治理的推进和防疫手段的进一步完善,与健康码治理逻辑相似的“行程码”随之诞生。行程码以城市为区隔显示用户的行动轨迹,可以作为以显示健康风险状况为主的健康码在行程轨迹方面的延伸,这两种“码”合作形成的疫情特色“码治理”,在出行管控中提升了公众的流动监测能力。“码治理”“技术体”的形成标志着健康码向社会诸领域渗透,也意味着覆盖面更广的、更具有弹性的、相对稳定的、具有支配力量的制度性治理网络的形成。

可见,从初级治理网络到制度化治理网络的形成,伴随着交替的稳定与冲突。正是在这个平稳与冲突交替的状态中,健康码逐渐进化为撬动诸多社会场域变革的制度化力量。各主体配合媒介化逻辑重新配置原社会场域中的资源,并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行动路线,推动既有治理网络逐步升级。直到今天,疫情形势虽然基本稳定,却也伴随着区域性、季节性的突发情况,制度性治理网络仍在迭代。

### 三、媒介化治理引发的治理风险

#### (一) 自主性媒介的数据安全

健康码作为自主性媒介,具有三点特征:“第一,技术自身及其发展具备不受其他因素支配的内在逻辑、规则,诸如自我衍生、自我强化、自我复制、自我组装和自我修复等特性;第二,人的技术化生存,包括技术对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感知偏向的影响;第三,社会的技术化,即技术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渗透。”<sup>[20]</sup>且其自主性引发的重要问题在于,因技术创新的速度过快,“既有的社会规范无力约束新兴的技术行为”<sup>[21]</sup>,从而产生一系列数据治理风险,形成技术治理挑战。

(1) 从算法黑箱角度,大多数公众对于健康码数据收集范围与数据收集类型并不了解,数据采集的边界在哪里?数据的使用原则和标准并不透明,公众何以得知数据收集后具体用于哪些治理领域?收集后的数据何时销毁?是否会被平台用于其他目的?如何防止数据被滥用和过度使用?(2) 从数据隐私角度,除健康码涉及的隐私问题,包括身份隐私(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年龄)、通信隐私(联系电话)、位置隐私(工作地、居住地、历史行动轨迹)与社交隐私(密切接触者)外,健康码是否会收集公众的其他隐私信息(如生物数据)?哪些类型的隐私信息被使用、分析?(3) 从算法偏见角度,媒介并非是中性的,健康码作为城市在特定社会历史时期依据特殊目标要求研发的创新技术,是各主体权力编织的产物,具有特定的价值偏向。健康码和其他智能技术是否存在算法偏见?包括程序设计偏差导致的算法偏见、测试数据偏差导致的算法偏见和机器自我学习导致的算法偏见。<sup>[22]</sup>公众可能会由于算法偏见问题,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某些风险要素(如中高风险地区居民、普通感冒患者)被无端放大,申请到与事实不符的健康码,出现“被红”情况。



## (二) 媒介化治理的隐形追踪

疫情期间, 为监督公众出行以防进入中高风险地区或接触新冠病毒感染者, 公众的出行轨迹往往是被智能媒介监控的。从国内采用的健康码技术到他国采用的热感摄像头、无人机监控无不是疫情催生的技术追踪手段。在英国, 无人机被用来监控偏远的美容场所, 自动车牌识别 (ANPR) 系统被用来识别长途驾驶的车辆; 在比利时, 政府使用电信数据来跟踪人口流动, 并监控购物街和海滩的人口密度; 在西班牙, 政府与主要电信商家合作开发了一个系统, 通过 GPS 和移动电话信号监测公民的流动性。<sup>[1]</sup> 公众生活在被技术监控的环境中, 其出行轨迹在云端被追踪, 信息数据为政府与平台所有。

媒介化治理的追踪行为可以帮助提高疫情防控治理能力, 防止疫情扩散并快速追踪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但同时也影响了疫情笼罩下本就压抑的人们的情感、想象与行为, 在深层意义上形成了人的“技术化意识”。公众出行前首先考虑到这一行动引发的技术追踪反应, 以及如果对抗技术会引起的制度性后果, 甚至会采取技术消极论的观点, 使得公众在城市的媒介化治理过程中, 因技术追踪产生对媒介与自我的抵抗。在这个意义上, 健康码治理既是边沁 (Jeremy Bentham) “圆形监狱”的再升级, 又是韩炳哲 (Byung-Chul Han) “透明社会”的治理术。

## (三) 政企合作中的平台垄断

如上文所述, 疫情初期, 平台依托数据优势、终端优势、人才优势迅速创新, 协助政府搭建健康码系统, 在常态化时期, 依然提供了主要技术支持。健康码创新高度依赖互联网平台的技术优势, 政府离不开对平台的技术依赖, 需要接受平台的服务架构、平台内部的规范和算法定义的规则, 这就使得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将治理权力、数据权力让渡给平台, 形成平台垄断的风险。

具体而言, 从健康码的平台载体看来, 多数省份将健康码申请入口设立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上, 如“浙江健康码”“山东健康码”; 也有省份设立在独立开发的政务 APP 上, 如福建的“闽政通”APP、蒙古的“蒙速办”APP 等; 还有一些省份依托其他平台开通了健康码申请服务, 如甘肃的“健康甘肃”APP 就是甘肃万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打造的医疗健康服务软件。由此可见, 虽是由政府统筹主导健康码的开发与推广, 但健康码的开发、搭载、运行仍多为平台主体承担, 即使是独立的政务程序, 也多是通过与平台端的合作进行日常维护更新。因此, 在政府与平台的合作中, 政府应当关切如何守卫治理中的话语权, 以及如何应对平台垄断的风险。

其他国家的疫情治理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抗疫背景下, 谷歌和苹果两家公司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合作”, 开发了一个跨平台应用编程接口——谷歌苹果暴露通知 (GAEN)。到 2020 年 5 月底, 五大洲的 20 多个国家申请了该应用编程接口, 包括英国、荷兰等。<sup>[23]</sup> 这意味着, 谷歌和苹果拥有了 20 多个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控制权。更为重要的是, 各国政府面临如何与平台协调数据权、守护政府的数字治理权和公民信息安全权的问题。

# 四、媒介化治理的风险规制

## (一) 夯实数据安全保障, 规范数据治理条例

夯实数据安全保障, 首先应从法律、政策、制度上推进数据安全立法、执法, 加强数据市场秩序监管。整体看来, 国外的信息安全立法起步较早, 国内近年来信息安全立法意识不断增强, 出台了一系列数据治理措施。据表 1 不完全收集, 美国 1966 年便颁布《信息自由法》。2019 年 1 月通过的《开放政府数据法》通过立法明确数据开放共享义务, 其对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日常审查、管理机制、报告评估等都进行了明确规定。<sup>[24]</sup> 2020 年 3 月, 欧盟发表《关于 COVID-19 大流行下数据保护权的联合

声明》。欧盟法院于 7 月宣布欧盟与美国达成的用户跨大西洋数据传输的“隐私盾”（Privacy Shield）因存在泄露风险而无效。2020 年 3 月 2 日，意大利敦促当地数据保护机构发布声明，澄清为缓解和遏制目的合法使用数据的条件，同时警告非机构行为者（如私人雇主）不得收集和处理侵犯隐私的数据。<sup>[25]</sup>

表 1 国外数据信息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国家/国际组织	相关法律法规	年份
美国	信息自由法	1966
	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	2002
	网络安全法案	2010
	国家网络基础设施保护法案	2010
	网络空间作为国有资产保护法案	2010
	数字政府战略	2012
	开放政府数据法	2019
澳大利亚	隐私权法	1988
	反垃圾邮件法	2006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	2009
英国	信息自由法	2000
	通信监控权法	2000
	网络安全战略	2011
	紧急通信与互联网数据保留法案	2014
印度	信息技术法	2000
新加坡	垃圾邮件控制法	2007
	个人信息保护法案	2012
韩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	2011
日本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	2013
	网络安全基本法	2014
	个人信息保护法	2015
巴西	个人数据保护法	2015
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关于保护隐私和个人数据国际流通的指南	1980
欧洲理事会	关于自动化处理的个人数据保护公约	1981
联合国	计算机处理的个人数据文档规范	1990
欧盟	数据保护指令	1995
	保护个人享有的与个人数据处理有关的权利以及个人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	1995
	数据保留指令	2006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2018
	关于 COVID-19 大流行下数据保护权的联合声明	2020

在我国,《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国家级条例的发布(如表 2),回应了疫情突发对健康码信息安全的管制缺口,以及长久以来数字治理中的信息安全保障问题。此外,省级政府机关如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2 月发布了《传染病防控人员健康码管理规范》,明确了健康码使用个人数据的范围。<sup>[18]</sup> 在市级治理中,杭州市发布了《杭州健康码开发运行规范管理办法》,保护对健康码使用者的个人信息。<sup>[26]</sup> 其中,《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规定了个人健康信息码的参考模型、数据格式和应用接口等。<sup>[27]</sup> 但由于该系列标准仅用了 14 天便完成了从立项到发布的流程,尚未考虑到将个人健康信息码的数据管理和算法伦理等问题列入其中,所以因突发公共事件而颁发的条文也需要不断修正完善。

表 2 国内数据信息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相关法律法规	年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1994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1997
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	2000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2005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	2007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	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2017
数据安全管理办法	2019
互联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指南	2019
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	2020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20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2021

（二）提升算法规则透明度，行使公众被遗忘权

健康码系统推出之际,其快速开发、应用、推广使公众尚来不及意识到系统后台获取个人信息后的处理方式并非透明,个人不清楚信息使用边界,因此需要提升数据规则透明度,减少数据黑箱造成的不良后果。伊恩卡(Marcello Ienca)和瓦耶纳(Effy Vayena)认为,一旦需要使用这些数据来源,并且认为是适当的,就应充分告知公众。应避免对数据的存取和使用保密,应该为共同利益而就数据处理问题进行透明的公众沟通。例如,数据处理协议应披露哪些数据被传输给第三方,以及传输的目的是什么。<sup>[25]</sup> 这一观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明示处理的目的、方式和范围”遥相呼应。<sup>[28]</sup>

健康码系统中的信息数据,如公众身份隐私、通讯信息、位置数据、感染状况等被存储在算法平台中,为政府和平台所有。数据持有者可以挖掘出用户的相关“推测数据(inferred data)”,<sup>[29]</sup> 挖掘出更多的公众隐私,而相关公众却没有个人信息的自决权和知情权。在疫情趋于常态化的当下,公众应当拥有删除数据的权利,以此来保护信息隐私。欧盟 2018 年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

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简称 GDPR) 中提到的“被遗忘权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为公众隐私保护提供了方向。被遗忘权是指数据用户有权要求数据活动主体在规定的期限内对数据依法进行删除的权益,<sup>[30]</sup>即用户有权要求在一定时限后删除与自己相关的数据。在数字化生存的信息时代,数据信息是重要的隐私,遗忘伦理的构建可以保证自身信息的安全、维护自身信息的自决权。

### (三) 加强互联网平台治理, 平衡政企关系

如前文所述,平台作为媒介化治理的重要主体,在与政府合作治理过程中存在垄断问题。因此,媒介化治理的风险规制需要特别注意平衡好政府与平台之间的治理关系。美国司法部(DOJ)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在2020年3月24日发布联合声明,希望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企业遵守反垄断法进行竞争性合作。<sup>[31]</sup>2020年10月,美国国会公布了针对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四家公司涉嫌垄断竞争的调查报告《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欧盟于2020年12月15日公布了专门针对数字巨头的反垄断法案《数字服务法案》和《数字市场法案》。<sup>[32]</sup>

为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律制度体系,我国互联网领域也开展了反垄断行动。2020年1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公布《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将互联网业态纳入这一体系中,针对互联网行业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标准进行了说明。<sup>[33]</sup>同年11月,进一步公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以预防和制止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为,激发创新活力。<sup>[34]</sup>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媒介化治理中,需要进一步通过风险规制平衡好政府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关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形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企合作治理模式。

### (四) 提升公众自主权, 保障公民权益

当健康码的媒介化治理深入到个人,以“人机结合”的赛博人为单位,治理活力的激发和治理创新更应以个人需求为出发点。在推动健康码治理过程中,虽然公众一定程度上拥有反馈、建议的自主权,但整体而言,公众的自主性不高、参与度不够。因此,应积极学习社会其他领域的治理经验,提升公众参与度。

德国在此次疫情中,由政府发起了关于抗击疫情的“Wir Vs Virus hackathon”运动,在48小时内,有28361人共同研究了1300多个对抗病毒的技术解决方案,政府与民间合作实施了130多个提交方案。可见,疫情当下,生命健康应当被置于首位,公务员与黑客可以为了丰富疫情解决方案、确保方案实施而进行合作。<sup>[1]</sup>而荷兰阿姆斯特丹市在智慧城市建设时,也关注到了公众与智慧城市协调开展规划行动的重要性,认为公众是智能城市项目实施和效益的核心参与者,促进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是智慧政府的一个重要层面。因此可通过访谈专家和用户,测试可用性、功能性和可访问性,鼓励公众实时评论和建议,设计社交媒体平台反馈端口等提升公众的智慧城市建设参与度。<sup>[35]</sup>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媒介化治理中,也应当积极调动公民参与热情,促进公民行动,以公众参与平衡过于严格的治理策略,使治理措施更为“人性化”,以此保障用户权益,保证突发事件的应急治理与常态化治理有序进行。

## 五、结 语

笔者尝试勾勒出健康码媒介化创新治理网络的形成过程,及其可能存在的风险与风险规制路径。诚然,媒介化治理已成为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的重要治理方式。媒介化能够以其自身逻辑对现有的社会资源进行重组,且多元主体必须在应急期迅速调整行动逻辑与行动路线,以适应媒介这一行动者的加入,以及这种因治理媒介化带来的社会场域的变革。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往往存在着漏洞。即便在常态化时期, 媒介化治理作为特定社会条件与特定价值目标前提下采取的社会治理方案, 其中必然包含权力关系与价值偏向。媒介化创新治理虽为制度化的治理方案, 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以媒介为主导。我们不必屈从于媒介, 及其可能存在的治理霸权。媒介化治理创新提供的可能性, 正如学者潘忠党指出的那样, “以传媒技术为资源, 改造时刻笼罩, 制约着我们的结构和意识形态体系, 或至少改造我们与它们之间结构性关联的形态”<sup>[36]</sup>。因此, 媒介化是机会而非牢笼, 我们应积极调动自主性, 将媒介化治理潜在风险规制在最小范围内, 确保技术向善。

## 参考文献:

- [1] Meijer, A. et al. (2020). The COVID-19-crisis and the information polity: An overview of responses and discussions in twenty-one countries from six continents. *Information Polity*, 1 (1): 243-274.
- [2] COVID-19 National Emergency Response Center, Epidemiology and Case Management Team & Korea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20). Contact transmission of COVID-19 in South Korea; Novel investigation techniques for tracing contacts. *Osong Public Health Research Perspectives*, 11 (1): 60-63.
- [3] 戴宇辰. 媒介化研究: 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 [J].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2): 147-156.
- [4] 胡翼青, 杨馨. 媒介化社会理论的缘起: 传播学视野中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 [J]. 新闻大学, 2017 (6): 96-103, 154.
- [5] [丹] 施蒂格·夏瓦. 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 [M]. 刘君, 李鑫, 漆俊邑,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41.
- [6] Välvirronen, E. (2001). From mediation to mediatization: The new politics of communicating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In Ullamajja, K. & Tarja, S. (eds.). *The Politics of Public Issues*. Helsinki: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Helsinki, 157-178.
- [7] 胡翼青, 王焕超. 媒介理论范式的兴起: 基于不同学派的比较分析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4): 24-30.
- [8] 张云山. 7天, “健康码”从杭州跑遍全国 一人一码, 大数据助力精准防疫 [EB/OL]. [https://zjnews.zjol.com.cn/zjnews/hznews/202002/t20200224\\_11704578.shtml](https://zjnews.zjol.com.cn/zjnews/hznews/202002/t20200224_11704578.shtml).
- [9] 陈培. 浙江将在全省推行“健康码”机制 各地可因地制宜确定具体规则 [EB/OL]. [https://ori.hangzhou.com.cn/ornews/content/2020-02/12/content\\_7674722.htm](https://ori.hangzhou.com.cn/ornews/content/2020-02/12/content_7674722.htm).
- [10] 娄晓涵. 杭州健康码运行情况如何? 现已开通网络申诉渠道 积极提高赋码准确性 [EB/OL]. [https://ori.hangzhou.com.cn/ornews/content/2020-02/16/content\\_7677339.htm](https://ori.hangzhou.com.cn/ornews/content/2020-02/16/content_7677339.htm).
- [11] 孙玮, 李梦颖. “码之城”: 人与技术机器系统的共创生 [J]. 探索与争鸣, 2021 (8): 121-129, 179, 2.
- [12] 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五个一”服务行动的通知 [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2/10/content\\_5568777.htm](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2/10/content_5568777.htm).
- [13] 徐秋韵. 长三角“健康码”互认通用 [EB/OL]. [http://www.cnr.cn/ah/tt/20200329/t20200329\\_525034322.shtml](http://www.cnr.cn/ah/tt/20200329/t20200329_525034322.shtml).
- [14] 黄舒旻. 广州“穗康码”可与“防疫健康信息码”“粤康码”一码通行 [EB/OL]. <https://new.qq.com/omn/20200411/20200411A009PE00.html>.
- [15] 武晓东. 广州市荔湾区发现1例新冠肺炎核酸疑似阳性人员 [EB/OL]. <https://news.sina.com.cn/c/2021-05-21/doc-ikmxzfmm3745860.shtml>.
- [16] 张晨牧, 陈育柱. 广州首创健康码“黄码”制度 助力疫情高效精准防控 [EB/OL]. <http://gd.people.com.cn/n2/2021/0628/c123932-34797777.html>.
- [17] 汪小磊. 6月27日疫情通报 | 广州中风险地区清零, 钟南山称对应“德尔塔”毒株“密接”概念应改变 [EB/OL]. <https://new.qq.com/rain/a/20210627A0747Z00>.
- [18] 单勇. 健康码应用的正当性及其完善 [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 (5): 53-60.
- [19] 史晨, 马亮. 互联网企业助推数字政府建设——基于健康码与“浙政钉”的案例研究 [J]. 学习论坛, 2020 (8): 50-55.
- [20] 单小曦, 别君华. 人性化与自主性: 媒介智能化进化的内在机制与双重结构 [J].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2019 (6): 50-62.

[21] 邱泽奇. 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 [J]. 社会发展研究, 2018 (4): 2-26, 242.

[22] 陈禹衡, 陈洪兵. 反思与完善: 算法行政背景下健康码的适用风险探析 [J]. 电子政务, 2020 (8): 93-101.

[23] Hoffman, A. S., Jacobs, B., van Gastel, B., Schraffenberger, H., Sharon, T. & Pas, B. (2021). Towards a seamless ethics of Covid-19 contact tracing app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3 (1): 1-11.

[24] 中国通信研究院. 2020 年数据治理研究报告 [R]. 北京: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20.

[25] Marcello, I. & Effic, V. (2020). On the responsible use of digital data to tackle the COVID-19 pandemic. *Nature Medicine*, 26 (4): 463-464.

[26] 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杭州健康码开发运行规范管理办法的通知 [EB/OL]. 浙江政务服务网, [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20/7/3/art\\_1229146992\\_6986.html](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20/7/3/art_1229146992_6986.html).

[27] 市场监管总局 (标准委) 发布《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 [EB/OL].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 [http://www.samr.gov.cn/xw/zj/202005/t20200501\\_314959.html](http://www.samr.gov.cn/xw/zj/202005/t20200501_314959.html).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21-08/20/content\\_5632486.htm](http://www.gov.cn/xinwen/2021-08/20/content_5632486.htm).

[29] 吴飞, 傅正科. 大数据与“被遗忘权” [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2): 68-78.

[30] 杨庆峰. 健康码、人类深度数据化及遗忘伦理的建构 [J]. 探索与争鸣, 2020 (9): 123-129, 160-161.

[31] 黄莉玲. 美国 DOJ 和 FTC 联合发声, 将加快疫情期间企业审查速度 [EB/OL]. <https://new.qq.com/omn/20200326/20200326A0MQKQ00.html>.

[32] 张志安, 李辉.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全球比较及其中国治理路径 [J]. 新闻与写作, 2021 (2): 82-88.

[33] 市场监管总局就《〈反垄断法〉修订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EB/OL].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 [https://www.samr.gov.cn/hd/zjdc/202001/t20200102\\_310120.html](https://www.samr.gov.cn/hd/zjdc/202001/t20200102_310120.html).

[34]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EB/OL].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 [https://www.samr.gov.cn/hd/zjdc/202011/t20201109\\_323234.html](https://www.samr.gov.cn/hd/zjdc/202011/t20201109_323234.html).

[35] Simonofski, A., Asensio, E. S., De Smedt, J. & Snoeck, M. (2019). Hearing the voice of citizens in smart city design: The citiVoice framework. *Business & Inform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61 (6): 665-678.

[36] 潘忠党. “玩转我的 iPhone, 搞掂我的世界!” ——探讨新传媒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 [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 153-162.

[ 责任编辑: 华晓红 ]